

2516

怒江文史資料選輯

第二十一輯



怒江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十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怒江傈僳族
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三年四月

主编：李道生

编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余 新 李道生 杨 浚

杨尚礼 高翰星

怒江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十一辑 1993年4月出版

编者：《怒江文史资料选辑》编委会

印刷者：昆明市政协印刷厂

发行地点：六库—怒江州政协

文史资料委员会

报刊准印证：（云刊）字第179号

工本费：2.00元

《怒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一辑

目 录

和 衷 共 济

- 风雨同舟四十年……………祝发清 (1)
- 李岳嵩简介……………李世荣 (16)
- 回忆我与共产党合作共事的经过……………仁开智 (26)
- 回忆碧江政务委员会成立前后的工作……………窦桂生 (30)
- 明智的选择——忆伯父段承经……………段文华 (35)
- 我在解放初期的工作经历……………依阿哈述 华国育记 (39)
- 爱国牧师约秀……………约 秀述 胡正生整理 (46)
- 忆独龙族爱国人士马巴恰开……………李世荣述 张北星记 (50)

民 族 经 济

- 建国初期的怒江金融工作……………王汝炽 (53)
- 忆建国初期的泸水民族贸易工作……………苏洪珍 (60)
- 对五十年代泸水县开展小额贸易的回顾……………艾 纶 (63)
- 老窝东大沟建成纪略……………施光耀 (67)
- 六库农具厂的始兴……………崔向弼 (69)
- 民国时期福贡利沙底的土陶生产……………木云湘 (71)
- 浅谈怒江石英资源的利用……………晶 莹 (73)

科 技 教 育

- 独龙江的自然特点及其重大研究价值
——记李恒教授首次独龙江越冬考察……………高应新 (76)

艰苦考察后写成的《怒江中草药》·····	周云川 (80)
在创建利沙底医院的日子里·····	陈国璜 (86)
把美好青春献给边疆医疗卫生事业·····	舒寿群 (91)
怒江民族中学概述·····	杨长青 (97)
忆国立大理师范的兴衰 ·····	马秉坤 艾纶 杨浚 整理(100)

历史与人物

福贡设治局长李腊泉为何被革职 ·····	王国英述 胡正生记(105)
和国梁其子和之潘抗兵抗款轶事·····	杨镜诚整理(108)
一次维护国家主权的土地之争·····	高树勋整理(110)
马导民在福贡的传教经过·····	胡学才搜集整理(116)
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 ——清扫马普拉底惯匪纪实·····	和绍远(120)

史 籍 资 料

蒲菖桶志 (续) ·····	菖蒲桶行政委员公署编纂(127)
卯照土司始末·····	段庚华(147)

民俗与文物

傈僳族习俗访记·····	洪 浚(156)
替命村傈僳族丧俗·····	李四明(160)
米俄罗斯古文化考察纪实·····	包秀芬(166)

风雨同舟的四十二年

傈僳族 祝发清

一、盼望黎明

我出生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县大兴地乡阿里王地村一个农民家庭。一九三三年在当地土司办的村立小学读书。两年后，又到江东教会学校读书。不久，由于家境贫寒无力继续求学，经一位亲戚的介绍前往腾冲县，瑞典国教会办的圣道学院继续学习，毕业后回乡。一九四二年正值滇西抗日战争炽热时期，十一集团军在怒江成立游击指挥部和福、碧、泸、练民众自卫支队。我在总指挥部的政治部工作，任务是宣传动员人民群众参加抗日工作。同时担任卯照区的宣传组长。我翻译了很多抗日宣传材料，比如传单、标语、告同胞书、抗日歌曲等，分别在傈僳族地区散发宣传，为调动广大傈僳族人民群众参加抗日起了很大的作用。

傈僳族同胞生活在边远的山区，生产力发展水平十分低下，遇有疾病、灾害除了杀牲祭鬼外，别无他法。为了本民族的发展，除提高文化以外，我决心学医，掌握现代先进医学，帮助各族人民解除痛苦。

一九四三年二月间，我到大理福音医院学医，并参加高级护士职业学校学习。同时还接受过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滇

西办事处的聘请，担任翻译和医务工作，从而使我在实践中掌握了许多医学知识和应用医学技术。

一九四七年，大理国立师范学校聘请我任校医。进校没几个月，学校就移至龙陵县镇安街。一九四八年八、九月，我请长假离校，赴腾冲县找朋友中医生邓燮坤。不料他是一个与地下党有联系的人，他十分关心我的前途。有一天他对我说：“我认识腾冲县地下党的人，还向他们汇报了你的情况，他们要我转告你：‘现在全国快要解放了，望你速回泸水，等待解放，决不要去缅甸。你们傈僳族象你这样读过书的人太少，共产党需要有知识的人参加工作。’”

我接受了他的建议，立即返回泸水。回乡后，由于当时许多人不了解党的民族政策，对共产党有怀疑，所以，有些亲友也劝我迁移到缅甸去。而且缅甸的傈僳族也曾来接过我，让我去帮助他们办傈僳文报纸。泸水县的外国传教士又劝我去泰国帮助教会翻译圣经。但由于我相信朋友邓燮坤的劝告是正确的，所以我拒绝出国，在泸水等待解放。

那时我看到傈僳人民在旧社会三座大山的剥削压迫下，过着极度贫困愚昧和落后的生活，心情十分沉重。我决心用自己的知识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于是，我首先动员群众学习汉语文知识，积极倡导建立学校。当时，四、五、六三个保没有一个学校。在我的倡导、动员下当地的保甲长以及一些有威望的人都积极响应。接着我与三个保的负责人一起向泸水设治局申请，获准建立学校，于是我们首先请了师傅盖教室并制备黑板、书桌、板凳等用具。但由于土司、镇公所反对，不许我们建校。所以，正在兴建的学校就这样半途而废了。造成很大损失。我对此感到愤慨，为什么公民

连识字权利都没有了。我多么想冲破这黑暗，盼望光明早日到来。一九五零年家乡解放了，傈僳人民也翻身见了太阳，广大傈僳人民想读书的愿望实现了，现在几乎每村都有了学校。

二、从政务委员会成立到保山工作团进驻泸水期间的工作

泸水县地处怒江州南部，东临大理州云龙县，西与缅甸接壤，南连保山，西南邻腾冲，解放前全县分属五土司管辖。一九四九年五六月间，泸水北部的碧江、福贡、贡山等县都相继解放了，只有泸水因情况复杂，尚未解放。

1949年十二月间，国民党设治局和部分土司头人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曾发生过阻击从碧江县派来泸水谈判和平解放的代表团的“称戛事件”，造成碧江来的民兵和自卫队人员有四人死亡。幸好当时云南省省长卢汉和平解放全省的通电及时发到了泸水设治局，命令一切部队和地方武装放下武器，听候改编，李春培等人自觉理亏心虚，才赶快与碧江地下党联系，要求派人来接管政权。

十二月二十六日下午，李春培等人又到我家，对我说：“请你帮忙给碧江县的窦桂生写信，请他们下来泸水商量和平解放的事”，我对他们袭击碧江县自卫队有意见，本不想帮他们的忙，但为了使泸水早日获得解放，我再三考虑后，还是答应了，当即用傈僳文给窦桂生写了一封信，交给本村甲长派人送出去。后来，双方果然如期在卯照举行了谈判，我又借此机会向窦桂生反映：现在泸水教徒思想有些混乱，主要是当心解放后是否会有信教自由的权利，建议他来称

夏，在补过圣诞节期间，给教徒们讲一讲党的宗教政策。他答应了我的要求，后来，他果然按时前来参加了圣诞节的活动，并在会上宣传了党的宗教政策，他的那次讲话对稳定教徒的思想，起了很大作用。

1950年元月间，我收到由称戛村送来的一封信，一看是张励吾（即张旭）同志写来的，要我在次日到江边围拉坝会见他。第二天我带着两个人到围拉坝去，恰好张旭同志也和其他五六个人到了那里，我们共谈了半小时左右。这是我与共产党干部的第一次会面。他对我讲了泸水和平解放后的领导工作问题；在山区建立学校和发展农业生产的问题，也谈到开展医药卫生工作和傈僳文翻译工作的重要性，他的谈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说明共产党对泸水人民是关心的，完全不象反动派所宣传的那样可怕。同时，我发觉他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他对怒江各族历史情况知道的很多，我对他深感敬佩。

他去鲁掌没有几天就主持成立了泸水临时政务委员会。我在称杆村接到了泸水临时政务委员会的委任令，指定我为临时政务委员会的委员，并兼任泸水税务工作。同委任令一起送来的还有一份会议记录。从会议记录知悉，张旭同志指定：李春培、段承经、茶光周、茶开周和我为泸水临时政务委员会委员，并推举李春培为主任委员。把泸水的和平解放和成立泸水临时政务委员会的事刊登在滇西北的报纸上。临时委员会成立后张旭同志指定施子昌同志留在泸水协助临时政务委员会的工作。他就去腾冲县了。

临时政务委员会成立后，泸水虽然搭了一个临时政务委员会的架子，但实质上泸水尚未彻底解放。因为设治局的保

卫队，各土司的自卫队尚未解散，同以前一样向人民摊派粮食和各种的款项，各土司尚未交出他们手中掌握的枪支，国民党的行政机构和人员一点都没有变动。不过临时政务委员会的成立对广大人民群众和国内外有一定的影响，对泸水彻底解放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临时政务委员会成立后经费十分困难。临时委员会成立时曾规定每位委员每月工资是二十元。但由于经济困难，工资都没有拿到。连主任委员李春培的工资都没办法解决。施子昌同志对此也无能为力。

当时，上级认为泸水县原属保山专区管辖，现在仍由保山专区领导更为恰当，因此，保山地委决定成立工作团由沈锡荣、赵鼎泽负责。他们于一九五零年四月七日由保山进驻泸水，共有二十一人。他们到了泸水后没有多久就召开泸水临时政务委员会会议，参加开会的除临时政务委员会委员之外还有工作团的沈锡荣、赵鼎泽、赵泽宗、赵志珍等人。会议内容主要是：一、由工作团说明来意，并传达保山地区领导对泸水的工作意见和指示；二、宣布临时政务委员会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泸水政权由工作团领导。在会议中决定给在称杆被杀的四位同志的家庭补助半开二百元；三、是研究了原设治局的旧职人员的留用问题；四、是泸水各镇开会时需要的粮食和经费。为解决目前的困难，决定向人民群众适当的摊派一些公粮。

工作团接管泸水后，为了向各民族、各阶层、各界群众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我曾参加过在县召开的两三次会议以及卯照镇和大兴地镇江西五保在称杆村的会议。当时，工作团的工作人员尚未学会傈僳语言，我曾协助工作团当翻译，工作内容包括书面文字翻译与口头翻译两种，其中

会议文件，领导讲话，以及标语、布告都属于书面文字翻译，工作量大，任务比较繁重。当时宣传的主要内容是“团结、生产、进步”的边疆工作方针和党的民族平等政策、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对待对民族上层和宗教上层的统一战线政策，以及泸水地区不进行土地改革等政策。工作团来了后不久，保山地区就派来了医务工作者，他们免费给各族人民群众治病，并吸收培养了当地的卫生员，选拔各民族优秀人才到保山地区民干校和卫训班学习。工作队的人还下乡帮助人民群众劳动、背水，做了许多好事，交了很多朋友。他们所做的一切，慢慢地消除了人民群众的疑虑，解除了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怀疑。从而使泸水的工作大有起色。

三、在保山工作期间的感受

一九五一年七月间，保山地区成立了联合政府。当时，我出席了成立大会，并当选为政协常委。于是，领导决定把我调往保山。我接受了上级领导的决定。回家乡泸水后，就动员我爱人去保山。由于我们刚结婚三个月，不仅要说服她，而且还必须做双方父母的工作，因此，调动之事还是颇费了一些周折。经过努力终于做通了爱人和双方父母的工作，一九五一年八月，我和爱人一道到保山工作。到保山后，无论在政治上、学习上或是生活上我都受到上级领导无微不至的关怀。我爱人被安排在保山民族干部学校学习，后来安排了工作。我们深深体会到共产党对少数民族的关怀。更坚定了我永远跟着党走的决心和信心。一九五一年十一月间，保山地区组织参观团去西南参观。我有幸成为参观团的一员，到昆明后，我们参加了省里召开的第二次各族各界

人民代表会议。会议结束时，周保中副主席召集保山地区部分代表座谈，并认真听取了各民族代表提出的在民族地区建立学校、医院、修公路等建议，周副主席对代表们的建议都一一作了答复。

会议结束后，当我们正准备到西南参观时，突然接到通知，由于内地在搞“三反五反运动”，来不及接待，让我们以后再去参观。因此这次西南之行只好取消。我们已准备好第二天返回保山。当晚，省委副秘书长侯方岳又通知我和另外几位同志，明天不要返回保山，要我们到北京开会。北京是我国的首都，正是我向往的地方，我心里非常高兴。

省民委领导同志怕我们乘飞机的寒冷，每人都发了棉大衣、手套、鞋子等用品。我们一同上北京的有六、七位各民族代表，他们都来自全省各地州。到北京前，我们先到重庆参观了中美合作所的“白公馆”“渣滓洞”。亲眼目睹了当年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残酷镇压和迫害革命者和进步人士的铁的罪证；看到了共产党人在以往岁月中是如何为捍卫真理，解放全中国而英勇不屈的斗争。看后，我深受教育。还写了一篇观感短文，刊登在重庆报纸上。参观后，我们很快又启程上北京。我们一到北京，就立即参加中央人民政府召开的民族工作扩大会议开幕式。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四十六个少数民族的代表，穿着各式各样的民族服装，我是第一次看到我国有那么多少数民族，心里感到十分激动。

此次会议着重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保障一切散居的少数民族成分享有民族平等权利的决定》，还听取了李维汉主任的《有关民族政策的若干问题》的报告。

我们怒江地区共去了四人，他们是贡山县的孔志清（独龙族），福贡县的霜耐冬（傈僳族），碧江县的张旭（白族），泸水县的祝发清（傈僳族），我们被分在西南组。组长是西南民族学院院长王维舟，副组长是云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张冲。后来在大会发言时，保山专区的傣族代表龚绶和怒江傈僳族代表霜耐冬还被推举作了大会发言。十二月卅一日闭幕后，工作人员通知我们元月一日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将在怀仁堂接见各民族代表，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使我们高兴得睡不着觉，恨不得马上就去谒见。一九五二年“元旦”终于到来了。当天晚上在怀仁堂举行了国庆文艺晚会。晚会前，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到了主席台，各民族代表激动万分，各地选出的代表首先上台向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献旗致敬，并和毛主席以及中央首长握手。台下的代表都激动地观望这一幸福而难忘的场面，坐在后排的代表因看不清毛主席，就纷纷站到椅子上欢呼着。为满足大家的愿望，毛主席走下主席台，在大会堂走了一圈，各位代表才满意地坐下来。当晚来的中央首长还有朱德、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周恩来总理因身体欠佳，未能出席。但元月十日，大会工作人员通知，让我们去谒见周总理。当我见到周恩来总理时，他穿着一套朴素的中山装，带着和蔼可亲的笑容，伸出那温暖的双手，我激动地紧紧握着总理的手。他慈祥地问我：“你是什么民族？”我告诉总理，我是傈僳族。总理又问：“是么什地方人。”我告诉总理，我是云南省保山专区泸水县人。由于我过分激动，我差点说不出话来。见到我早已仰慕的周总理，这是我终身难忘的时刻。时至今日，那次接见的情景还历历在目，每当我想到时，心里总是热呼呼的。一

九七六年一月八日，我在兰坪农村插队落户时，我打开收音机突然听到敬爱的周总理逝世的消息，十分震惊，悲痛得撕裂了我的心，眼泪禁不住簌簌往下流。

大会结束后，我们又分别参观了上海、南京、天津、杭州等城市，在南京参观期间，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刘伯承还来作了国内外形势的报告。

元月中旬，我们带着中央的关怀和鼓舞，信心百倍地返回云南。通过这一参观活动，我深深体会到，党的民族政策的正确性和真实性。特别是通过一系列有关文件的学习和讨论。认识到在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下，各民族不论大小和强弱均有平等的权利。党主张民族平等团结，反对民族之间的压迫和歧视，反对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这是历代剥削阶级不可能做到的。没有共产党就不可能实现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

回到保山后，保山地委让我到泸水县向广大傈僳族同胞和其他少数民族宣传民族工作扩大会议的精神。我接受了这一任务，很快回到泸水。在泸水江东江西一直到碧江县交界地向各少数民族人民作了广泛的宣传和传达，使党的民族政策更加深入人心。

在保山工作期间，地委征求我的意见，要调我到专署卫生科担任副科长职务。我怕承担不了这个责任，但由于地委的鼓励和支持，经省里批示后，给我发了委任状，我只好接受了这一任务。当时，卫生科任务很繁重，专区医院没有院长，我又兼任了院长的工作，同时还承当了卫生培训班的工作。有一段时间，政协秘书长到昆明党校学习，我又兼任代理秘书长的职务。这样一来，我的工作负担实在太重，几乎

承受不了。后来我向领导提名专区医院的院长副院长，领导同意后委任了两名负责人，我就减轻了负担，当时，我深感上级党很信任我，专署领导对我十分关心，不论我的工作、生活他们都无微不至的关怀。尽管很辛苦，但我心里总是暖洋洋的。特别令我难忘的是，有一次保山县境内发现鼠疫，专署立即组织医务人员奔赴疫区除害灭病，当时，专县两级医院和部队派的医务人员都由我带队去灾区，此时，恰逢我爱人卧病在床，但我还是服从上级领导的安排，毅然奔赴灾区。当我回来时爱人告诉我：有位副专员（外省人）亲自来给她送过饭，并指派一名干部经常来照顾她，帮助收拾房间，我听后感激涕零，十分感激领导对我的关怀。

四、调省参加民族语文工作

一九五三年中科院语言研究所傅懋绩等专家来昆明开创民族语文工作，省政府向保山专署借调我去参加研究傈僳语言工作。在傅懋绩专家的指导下，我与爱人蔡鸿英和木玉章等同志合作，翻译了《走苏联老大哥的路》《当芦笙响起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廿四年画册》《祝贺弥勒彝族自治县成立》《国境线上擒匪记》《疟疾与疟蚊》等傈僳文丛书。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我作为一名傈僳族语文工作者，对本民族语言文化具有自然深厚的感情，同时，感到对弘扬民族文化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一九四五年起我就开始搜集本民族的诗歌、故事、谚语、舞蹈、音乐、童谣、风情、原始宗教、近代宗教史。至一九五九年共积累资料达二百万字左右。其中，有一部份保存在老家泸水，另一部份则在大跃进中与其它资料

包括许多外文、傈僳文、汉文书籍一起被抄，并被付之一炬。半生心血顿化灰烬，令人心碎。一九六六年文革时期在昆明保存的调查材料，采访记录，编译的书稿、民间文学等许多资料不幸被造反派抄家作“四旧”全部没收烧毁，这是我一生中多年辛苦的成果，都一朝化为乌有。尤其令人痛心的事是许多优秀民歌失传，因为民间歌手已作故人，材料不可再得，这是我一生最为痛苦伤心和遗憾的事。

一九五五年和一九五六年，在云南文联的指导下，我与蔡鸿英合作记录整理了傈僳族民间叙事长诗《生产调》。并经徐嘉瑞同志协助用汉文和傈僳文分别出版。这是傈僳族历史上第一次用本民族文字出版的民族文学遗产，在国内外影响都很大。一九七九年，应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傈僳语组的要求，我把《生产调》压缩成三百行，并与傈僳族音乐“摆拾摆”相配在电台播放了一年，很受傈僳族人民欢迎。《中国少数民族作品选》编辑委员会将《生产调》中的11至20节（108行）选入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云南民族学院傈僳语班将此书中的11至20节当作教材列入课程。日本文艺界将这本书介绍到日本。

一九五六年我与徐嘉瑞同志合作翻译发表了《傈僳族的医师》《绿斑鸠的故事》《傈僳族求婚调》这些译文相继发表在云南日报及北京民间文学。

一九五六年我用傈僳文创作了一篇《傈僳族情歌》并译成汉文后发表在《边疆文艺》（一九五六年11月号）。云南广播电台对此《情歌》的内容作了介绍，并作了多次播放。

一九五三至一九五四年，应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邀请，我在电台发表讲话。每次讲话前我都用傈僳文写成，然后译成

汉文给编委批准后，最后用傈僳语文录音播发。

五、曲折的遭遇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省民族工作部门召集边疆民族上层和宗教上层爱国人士集中昆明市黑林铺学习。通知时说的是民族工作座谈会，而实际上则是开展肃反运动的序幕。当时，上级召来了不少贫下中农和基层干部参加我们学习，领导说是帮助我们学习，实际上是让他们来批判斗争我们。会议一开始，由领导在大会上作动员报告，然后是讨论。小组讨论，主要是根据领导的报告，并结合自己的问题进行检查交待。如果领导认为没有问题的，那么就算通过。如果认为有问题没有检查交待，那就不予通过。我在小组会上几次检查交待都不能通过，因此，我被揪到大会上批斗。他们追问我的事，是我连做梦都没有做过的事。他们将帝国主义分子、特务、间谍等莫须有的罪名纷纷强加在我的头上。在当时，我实在难以理解，解放后，我诚心诚意跟着共产党走，听共产党的话，从未做过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解放前，我参加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工作，那并不是什么间谍、特务活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也不是什么间谍组织，它是一个由各成员国组织的，虽然当时，新中国还没有加入联合国，但是苏联早已是联合国的成员，此外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加入了联合国。这些国家也参加了联合国的善后救济总署工作。如果我是特务、间谍，那他们不也都是间谍、特务了吗？所以，我当时感到自己被冤枉，也实在弄不懂为什么要那样做？他们要我认真交待，我想，共产党常说：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既然我没有做过对不起党，对不起